

导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女性”

本书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妇女形象，根据他所涉及的妇女遭强暴、遭男性虐待的事实以及他对“女性”的建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展开探讨。虽然这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度是“女性主义者”的角度，但实际上“妇女问题”并未被归入更大的构架中。本书不想把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而是要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扩大女性主义的话语。因此，以下章节将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 20 世纪末的定位来探讨对作品的新的解读。

如果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作品中有关妇女的主题已引发了无数的评论，^① 那么相比之下，这一工作早就过时了；如果我们注意到评论家们已经发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边缘”、“门槛”的题旨，以及犹疑不定和“近乎反常的信仰转换不定”等题旨，^② 这一课题也并不新颖了。性爱 and 精神的体验之间界限模糊（不论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还是他小说人物的生活中），这揭示出他多层面的心理学和复调的创作风格。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能理智地

① 参见，例如朱迪思·阿姆斯特朗（Judith Armstrong）的《不言中的安娜·卡列尼娜》（*The Unsaid Anna Karenina*）（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8）；玛丽·埃文斯（Mary Evans）的《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反思》（*Reflecting on Anna Karenina*）（伦敦：鲁特里奇，1989）；艾米·曼德尔克尔（Amy Mandelker）的《构筑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妇女问题和维多利亚小说》（*Framing Anna Karenina: Tolstoy, the Woman Question, and the Victorian Novel*）（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和由艾米·曼德尔克尔主编的有关女性主义和妇女问题的《托尔斯泰问题研究》（*Tolstoy Studies Journal*）杂志（1990 年第 3 卷）。

② 这是罗宾·福伊尔·米勒（Robin Feuer Miller）的词语，出现在她于 1993 年 4 月 25 日，在耶鲁大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实验室所作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顺势疗法的剂量”（*Dostoevsky and the Homeopathic Dose*）的谈话中。

对待危机感，并敏锐地洞察到“西方一流的话语越来越不足以尽显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么他在小说中所着重刻画的是，这场危机如何引发出了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的问题。^①他反对西方的还俗意识和精神破产，为此他采用将“女性”神圣化的形式；但是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某种男性性别歧视的冲动是如何利用女性的精神性并将其色情化的，这种神圣感又被大大地削弱了。他对女性主义话语的贡献在于，多方面地揭露出男性自由与女性解放之间的冲突。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指出，西方人对强暴和虐待儿童现象的重视“集中在对艺术的审查和对色情文学的查禁上，而不是在对男性性暴力的社会结构的审视上”。^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视角度，是传统读者和女性主义者都未能充分展开的。当他的男性信仰转变者／堕落者在他寻求上帝或拯救时，“女性”作为一个与对男性气质的含义和男性追求的困惑相联系的问题出现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作品的情节和结构清晰地显示了其男主人公欲通过暴力来压制“女性”的种种企图，其结果却反而动摇了他们原先的假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女主人公扮演了最难表现的、最无声无息的、最边缘的，却又最具现代性的角色。当他的“正面的”、传统的妇女常常充当罪犯或饱受煎熬的男人的救星的时候，他的“新”女性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对传统的男性气质进行猛烈的

① 参见爱丽丝·贾尔汀（Alice Jardine）发表在《女性》（*Gynesis*）上的就文学和合理性的危机”而展开的讨论（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从第99页开始。

②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性混乱：世纪末的社会性别和文化》（*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de-Siècle*）（纽约：维京出版社，1990），第4页。伊娃·科索夫斯基·谢德戈维科（Eva Kosofsky Sedgwick）和劳拉·恩格斯泰因（Laura Engelstein）的《幸福的秘诀：世纪末俄国的性和对现代性的追求》（*The Keys to Happiness: 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ècle Russia*）（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2）和谢德戈维科的《男人之间：英国文学和男性的同性社会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

抨击。“新女性”的概念是 19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政治大潮时从法国引进的，它成为有关俄罗斯未来的争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思考中心。他的“反面的”、歇斯底里的、具有叛逆精神或者自杀倾向的女性人物使我们意识到了激烈变革的社会关系，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里竭力想要抗争却最终未能如愿的东西。他对要求改变两性之间关系的“新”女性的迷恋可能象征着弗洛伊德的所谓自我压抑的消失。^①新女性的渴望和痛苦通过《赌徒》中波丽娜清晰地表现出来，但又通过《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费利波夫娜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而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受到质问。这种欲望和痛苦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别的场合所否认的现代化思想的吸引力。陀氏的作品表现了查尔斯·泰勒所谓的现代身份转变的权力，尽管就连小说家本人也反对这种权力。^②

也许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一部以女性人物为名的大部头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只是一部次要作品），所以读者并没有像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那样总是被引向妇女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的社会主义英雄主义持否定态度，并且旗帜鲜明地支持斯拉夫派、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皇，这表明了他的反女性主义的立场。发现这一点的 20 世纪后期的女性读者，很少能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旨在终止对妇女进行社会压迫的直接评述，因而会支持巴巴拉·海尔特（Barbara Heldt）对作者的评价，即“作者是男性沙文主义和女性恪守妇

① 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第十二卷，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译（伦敦：荷加斯出版社和心理分析研究所，1953）。

② 在那些研究过这个意义深刻的矛盾之处的哲学家中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自我之源 现代身份的塑造》（*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中用了好几页篇幅讨论《群魔》（*The Possesse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从第 447 页开始。

道观点的帮凶”。^① 然而，这样的评价并不完全契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广度和宽度的直接判断，也不符合对其作品的广度的理论评价，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阅读氛围中，在那里，米哈依尔·巴赫金的理论和解构的自由力量受到欢迎。

即使在斯拉夫学中，社会性别理论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冷战的结束，伴随着对女性主义的同化，社会性别及多文化的话语，正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阅读习惯。以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站到非左即右的队列里，认为他要么是个自由者，要么是个反动者，这种倾向近来已让位于一种一致性的看法，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对话”作家，或者用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的话说，他是一位探索揭示一个“极端不稳定”世界的边界和可能性的作家。^②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时期的批评家把《群魔》当作对斯大林主义的一部毫无幽默感的预言性攻击作品来读。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评论家似乎带有狭隘的政治色彩，就好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Yipsels”（人民社会主义青年会员）把《罪与罚》当做《共产党宣言》的阅读指南来读一样。^③ 阅读视野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是在世纪末，正如弗兰克·柯摩德（Frank Kermode）提醒我们的那样，具备变化的眼光（及加强观察和综合的愿望一样）变得更为重要。

受巴赫金观点的影响，近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阐释说明

① 巴巴拉·海尔特（Barbara Heldt），《可怕的完美：俄国文学中的妇女》（*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in Russian Literature*）（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加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体裁的边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和文学乌托邦传统》（*The Boundaries of Genre: Dostoevsky's Diary of a Writer and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Utopia*）（奥斯汀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第 4~7 页

③ 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在《乌托邦里的任务分配》（*Assignment in Utopia*）（纽约 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7）中，描述了“腋下夹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上“社会主义星期日学校”的情景（第 7 页）。

了这种变化。学习文学史的学生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巴赫金文本的英译本与女性主义话语赢得了广泛的听众，以及苏共开始解体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巴赫金长久以来一直被斯拉夫学者看做是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家。而在美国，当文学批评在一个后殖民主义、后冷战以及后父权制的文化中被引入到他者地位和“他者”的问题时，巴赫金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巴赫金将“对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独白的”托尔斯泰比较而进行阐释的兴趣，和对欧美文化的霸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entrism）的批判一道形成了一种文学的气候。虽然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赫金理论最初的介绍者和英文译者常常探讨那场使巴赫金再度引起世人关注的文化变革，但几乎无人把“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当做这场变革的重要方面来提。然而，到 1990 年，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已不能被斯拉夫学中的保守因素所容纳。对如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等各个不同作家的可能的对话体感兴趣的文学评论家们正在制造一种“女性主义者”对话体学。^① 不论巴赫金主义者欲保留还是发展这位俄国批评家的原有观点，他们都受惠于他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可发展为复调／对话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或是独白体（托尔斯泰的）诗学——后者常被描述成对读者意识的一种专制。

托尔斯泰的世界 [巴赫金写道] 整体上来说独白的；男主人公的话语被限制在作者关于其话语的固定构架内……托尔斯泰的话语和他用独白表达的天真观点无处不在，并渗入世界和心灵的每个角落，使一切服从于一个整

^① 戴尔·鲍尔（Dale Bauer）主编，《女性主义，巴赫金和对话体》（*Feminism Bakhtin, and the Dialogic*）（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1991）。

体。^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服从或强加这种整体性，也没有将自己的独白思想硬塞给他的小说人物，这一发现是本书探讨他小说中妇女的切入点。如果我们把对话体

独白体的差异解释为巴赫金批判独裁制的代码语言，那么他有关托尔斯泰是征服者的言论也许会被误认为是对约瑟夫·斯大林的评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悔罪……公式……范畴和它们通常的独白功能的不信任”，^②巴赫金表示赞许。这种赞许和有关男性将独白强加给女性声音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共同语言。虽然巴赫金的文学分析，从未直接提及苏维埃或社会性别政治，但他对专制的批评既暗含反等级制度和反苏思想，又暗含女性主义思想。

巴赫金的理论为分析独白性与父权制话语之间的联系，以及复调和妇女的声音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法。他写道，“具有内在争辩性的话语——能从旁瞥见别人敌视词语的词语——实际上在面对别人的词语或预料到别人的词语时便畏缩了。”^③他的描述阐明了那些在意识边缘或恐惧下的说话者的心理状态，比如陀氏的《群魔》中跛足玛丽亚对“英雄”斯塔夫罗金的诉说，以及妓女索尼娅在《罪与罚》的开始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诉说。用预先设定的性别问题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计划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即分析“主仆”关系问题或汉斯·乔斯（Hans Jauss）所描述的“在许多方面的易位问题：……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在文本的过去与接受者的现在之间，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下面几章中所提供的阐述遵

① 米哈依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卡里尔·爱默生（Caryl Emerson）译（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第56页，黑体强调为笔者所加。

② 参见巴赫金，《问题》从124页开始，有关狂欢节和梅尼普斯的论述

③ 巴赫金《问题》，第196~197页。

循乔斯的直觉，即“人类理解……起源于与艺术创作和接受的相互作用”，并且“从其本质来看”，是“在对他者的理解中，实现对自己的理解”。^①然而，至今那个被我们的文化所接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那些没有听过“他者”声音的男人们所“创作”的，或者虽听过但发现它“并不友好”。^②

然而，就在最近，女性学者认真研究了俄国文本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问题，结果发现女性主义和具社会性别指向的词汇正在被斯拉夫学所同化。在《俄国文化中的性和身体》中，简·科斯特洛（Jane Costlow）、斯蒂芬尼·桑德勒（Stephanie Sandler）和朱迪思·沃利斯（Judith Vowles）修正了这样的观念，即：“对性”感兴趣的是“西方人而非俄国人”。并在陀氏作品中发现了较近期的俄国和苏维埃式对性欲和恐惧进行探索的“阴暗面”文学渊源。^③对于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以至当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主义研究正在把“女性问题”从文学批评的边缘引向中心。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当前历史形势的界定，在他 1877 年 9 月的《作家日记》的记录中，陀氏本人提供了对他的作品进行带社会性别指向的重读线索：

① 汉斯·乔斯（Hans Jauss），《问题和答案 对话理解的形式》（*Question and Answer: Forms of Dialogic Understanding*），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s）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第 208~209 页。

② 加里·索尔·莫森论述道：“虽然英语或比较文学教授们多半不会意识到斯拉夫理论传统与他们自身理论传统的差异，而斯拉夫主义者却不会忽略。斯拉夫主义的一系列的影响是可预见的。一些人开始对所有理论谨小慎微。另一些则竭尽全力使自己与非斯拉夫主义的对手相像。但人为的痕迹太明显了。”（“《俄国种群》导言，”（*Introduction: Russian Cluster*）PMLA 107 [1992 年 3 月]）：228。

③ 科斯特洛（Costlow）、桑德勒（Sandler）、沃利斯（Vowles）共同编辑的《俄国文化中的性与身体》（*Sexuality and the Body in Russian Culture*）（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第 8~30 页。

我们怎能继续否认这位彰显了勇气的妇女在教育、职业、职位上享有和男人完全平等的权利……为了我们的社会的新生和崇高，我们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作家日记》^① 第 846 页）

作者的表述并未向我们提供某些必要手段，来探讨他在作品中如何对“女性”进行刻画。相反，他的小说充分地表现了“妇女问题”的后果，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妇女在当时法律下所受待遇的日渐焦虑。这种焦虑在日记的一个小故事中有所记载：1876 年的《温顺的女性》（另一译为《驯顺者》）将他对妇女的评述与他承认自儿时起便被强奸罪的阴影所笼罩这件事结合起来，足以证明贯穿他所有作品的一种涉及女性的性心理恐惧症。盖尔·耶茨（Geir Kjetsaa）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描述了下列事件：

（1870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和客人们讨论什么犯罪应当被定为最大的犯罪……“最可怕的犯罪是强奸儿童，”作家急迫且神经质地说道。“剥夺生命——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毁掉对爱之美的信仰”。他联想到儿时在父亲为穷人开设的医院发生的一件事。一位曾是他的小伙伴的幼女被奸杀了。“……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陀氏继续道），这是最可怕的犯罪，最深重的罪孽……我正是用这种罪行来惩罚斯塔夫罗金的。”^②

① 本书采用鲍里斯·布拉索尔（Boris Brasol）的英译本（盐湖城，犹他州：吉布斯·M. 史密斯公司，1985）。

② 盖尔·耶茨（Geir Kjetsaa），《费朵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生平》（Fyodor Dostoevsky: A Writer's Life），希里·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和大卫·麦克达夫（David McDuff）译，（纽约：维京出版社，1987），从第 327 页开始。

追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极端大男子主义犯罪根源的文字游戏始于斯特拉霍夫 (Strakhov) 1883 年的一封信。信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浴室里对一位小女孩施暴。罗伯特·L. 杰克逊曾讨论过那封信以及托尔斯泰对它的答复和“通过巴赫金”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辩论。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具备精神分析意识的评论家们来说，杰克逊重新揭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焦点话题。但它可能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引起 20 世纪 90 年代读者的关注。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个个性问题涉及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是品德败坏的堕落者，以及斯特拉霍夫是否由于自身的原因而恶意中伤这两点作出判断。而就杰克逊而言，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地下人”一样，“完全处于挣扎之中”，^① 这个观点或多或少可以解答对女性的性侵犯问题。这种对男性道德堕落的批评性讨论可能不会引起女性主义者的专注，不过它们却由此走向笔者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男权主义心理的问题。

究竟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还是从性别中立的角度更能透彻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心理——这是本书质询的中心。这种质询承认作家“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挣扎，但对纯粹的弗洛伊德式阐释则持怀疑态度。传记中所承认的诸如被强奸女孩这类故事，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外”的暴力，从而既削弱了作家对强奸的兴趣仅仅是他个人的病症的说法，更动摇了“文本

^① 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Jackson) 于 1993 年 4 月 25 日，在耶鲁大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研究室发表了有关讲话，题目为：“从地下看世界：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克霍夫的一封信关于他的好友费朵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以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对此的有趣反应”。

的外部不存在”^①的观点。由于今天陀氏作品的“外部”不但包含了欧美关于性虐待和性别歧视的公众讨论，还包括了女性主义话语，因此小说家作品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来不可避免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描述男性对女性施暴以及她们对施暴的不同反应的那股冲动，不仅仅是他作品的一个因素。它是陀氏的观点及其形而上的一个构成部分。陀氏对社会性别关系文献的贡献也许并不符合意识形态正确的西方观念，但它可能将当代女性主义暴露于自身的矛盾和局限之下：自我的“女性”式和“男性”式的建构是如何取决于，诸如“自由”和“自主权”的孕育和利用的方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奉献给读者的有关男性冲动和社会构筑的男性身份的问题并非来源于我们所理解的作家对女性主义“解释”的洞察，但却导致了他对“俄国男子的”邪恶性的表现。它来源于对于与女性相关的男性气质情结的探索，这是任何 19 世纪的作家都无法匹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主义主体性的贡献产生于一个特别俄罗斯化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对女性气质的象征性颂扬与实际上对妇女的贬低之间的鲜明对照，给目前的文化困境带来了启示。

对斯特拉霍夫的争论持续的兴趣，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拉霍夫、斯维里加洛夫、费朵尔·卡拉玛佐夫——所有这些强奸者的惩罚，表明了为什么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主体甚至对怀疑女性主义的读者来说可能也是重要的。小说描写了性别差异的问题，还描写了分别在几个方面展现出来的主仆关系的问题：在男女关系密切并包含家庭生活的家庭内部（例如，马美拉多夫一家以及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和杜尼娅的关系）；在男人与易受伤害年轻女子对

^①文本是自洽的产物，此观点是新批评主义的老生常谈。在 20 世纪 80 年代，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有关“形而上学史的‘解构’”的观点以及“写作犹如语言的游戏”的观点强化了这一思想。参见德里达的《关于写作》（*Of Grammatology*），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译（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第 83 页和 315 页。

峙的街头和妓院里（像地下室里的人与丽莎对抗；费朵尔·卡拉玛佐夫强暴“臭丫头”丽莎维塔），以及在法庭生活中（如《日记》中所描写的，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阅读控告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弑父罪的信时，以及通过陀氏对科尼诺娃案例的兴趣而得到最生动最戏剧化的表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法律专家所熟知的那样，包含了两性关系的家庭、“地下人”以及法律世界揭露了多种多样的由社会性别引发的问题，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70 年代越来越官司缠身时意识到的问题。

就像劳拉·恩格斯泰因（Laura Engelstein）在《幸福的秘诀：世纪末俄国的性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所揭示的那样，1861 年后，俄国“受杰里米·边沁和 J. S. 穆勒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把‘妇女问题’看做为社会改革问题的内在本质”。^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个人经历，他对女犯人的采访以及他在 70 年代对女性自杀的描写使他更接近这些问题，尽管他反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他对妇女疾苦的了解，以及他对乔治·桑早期作品中新女性的仰慕，对他创作人物情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创作的深远意义至今仍使我们所不得不重视。

评论家已把乔治·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认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原型：《罪与罚》中的杜尼娅，《赌徒》中的波丽娜，《白痴》中的阿格拉娅和娜斯塔霞，《群魔》中的丽莎·图申卡，《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治·桑的《莫普拉》印象尤深（参见 1837）。在作品中，乔治·桑让伯纳德·莫普拉用自己的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因此她的准女性主义意向主要通过男性忏悔者的自我分析显露了出来^②。莫普拉对自

① 恩格斯泰因，《幸福的秘诀》，第 115~116 页。

② 乔治·桑（George Sand），《莫普拉》（*Mauprat*），黛安·约翰逊（Diane Johnson）译（纽约：达卡波出版有限公司，1977）。

已表妹着了魔似的爱恋，他内心疯狂的肉体冲动与崇高的献身精神之间的斗争，连同他被指控因恼羞成怒而企图强奸并杀害表妹——这一切构成了以男性通过女性达到自我发现为主题的一幕情节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尽管《莫普拉》具有卢梭主义的理想主义和哥特派的成份（粗糙的激情，废旧的城堡，背叛的亲戚，奸诈的牧师），作品仍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一位基督圣像般的妇女形象。她赎回了一位“堕落的”男子，与此同时，以提倡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来与之对抗。乔治·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刚刚形成的社会性别文化的构想共产生过三次共鸣。在《莫普拉》中，男主人公企图强奸艾德梅，她使用刀子威胁他，而他最终羞愧地放了她。在《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为了强奸杜尼娅，将其锁在屋中。她于是向他开了枪（打偏了），他被感动而放了她。在这幕情节的最后，莫普拉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叫喊道，“你并不爱我”。艾德梅和莫普拉和好如初，莫普拉所言——“（你若不）发誓爱我，我便让自己脑袋开花。”——《罪与罚》中斯维里加洛夫实践了这句誓言。

在产生共鸣的第二个情节中，女子读书给男子听，而她的声音影响或转变了他。正是这样，《罪与罚》中索尼娅通过阅读圣经中的拉撒路的故事影响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而在《莫普拉》中，艾德梅充当了伯纳德·莫普拉的文学老师。“我想象着”莫普拉说，“这些作家（蒙田、孟德斯鸠等）的思想经艾德梅的双唇发出便显得意想不到的清晰易懂，一听到她的声音我便茅塞顿开。”（《莫普拉》第 143 页）在《莫普拉》的最后一幕审判中，如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审判场景一样，由一位女性宣读一封指控某男子的信，证实他杀父的冲动，并参与提供使他被定罪并接受惩罚的证据。在《莫普拉》中，“读信”在宣判中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信中表示想杀艾德梅——这一情景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法庭上对德米特·卡拉玛佐夫的不利作证相似。

笔者在本书的结论中提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女性改变男性的潜能来自于作为男性敏感化的一个自觉部分的妇女易受性伤害的个体差异。乔治·桑在《莫普拉》中的主题正是莫普拉的敏感化问题，即他对强奸问题、妇女需要的东西和受教育妇女的力量的敏感。艾德梅想要的“被改造的”男子必须懂得“强扭的瓜不甜”（《莫普拉》第 113 页），并且她“永远不会屈服于男人的暴虐，既不会屈服于丈夫的拳脚，也不会服从于情人的暴力”。（《莫普拉》第 131 页）

也许是从乔治·桑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发现了女性的声音是如何在其男主人公的意识里制造出一种“透光孔”，巴赫金把它描述为“改变一个人自身言语的终极意义的可能性”^①。《莫普拉》中，乔治·桑的声音可解读为在社会创造的男女语言区域之间构筑桥梁的一种尝试。她的话语也在传统宗教对于精神性的各种表达与对于“精神”的富有浪漫表现力的世俗化（女性化）之间进行沟通。艾德梅是精神的，因为她坚持主张妇女回归自由与平等的金色年代；但她又是女性主义的，因为她要求改变夏娃对亚当的从属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乔治·桑那儿“抄袭”来的女性反抗的情节表明，俄罗斯吸引着一种可能出现的未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信仰上帝和女性主义冲动不再对立，性本质主义也不再使压迫合理化。

除了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② 关于性本质主义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已不再出现于多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的评论中，虽然心理分析评论家们提出了某种关于涉及了女性主义者的作品的问题，例如他们提出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后期作

① 巴赫金《问题》，第 233 ~ 234 页。

②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话语体裁》（*Genres in Discourse*），凯瑟琳·波特（Catherine Porter）译（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第 89 页。

品中转向将男性人物女性化，梅什金公爵和阿廖沙即如此；为什么在最后一部作品中对愤怒和谋杀的表现从母性（在《罚与罚》1867）转向父性的（《卡拉玛佐夫兄弟》1881）的层次上。^① 这些作品要么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性“本质”的差异，要么将心理分析的重点体现在涉及女性“客体”的男性“情结”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大体上提供了三种对“女性”的解释：（1）写于1970年前对人性的传统解释，它们并未把性别差异问题化，这也包括巴赫金在内；^②（2）1970年后女性主义解释，已将性别差异问题化；（3）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评论，包括泰勒、乔斯和托多洛夫，他们提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重读本身可以改变较大的哲学焦点问题以及女性主义争议的问题。从读者对小说的接受历史过程中，可以揭示“女性”随着其出现和转移、被压制又被发掘而不断变化的地位。虽然我将这个大问题留给别人，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小说，带着它们那须竭尽全力方能被人们触及的俄罗斯深度，对于20世纪后期的女性读者来说，比对于她们的先辈们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似乎被置于一个没有定论的解释空间，它介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第一”与“第三”世界之间；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也许就是它们的部分力量所在。由于关于博爱、平等、解放和妇女权力的思想是从资本主义的、世俗化的西欧引入

① 路易斯·布雷热（Louis Breger）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作家》（*Dostoevsky: The Author as Psychoanalyst*）（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9），第125页中用心理分析而不是女性主义的方法探讨了这个问题。

② 参见卡里尔·爱默生和加里·莫森在《米哈依尔·巴赫金：一种诗学的创造》（*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oetics*）（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中的评论；以及在乔·安德鲁（Joe Andrew）在他回顾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时的论点，即“巴赫金性盲”这写在了《斯拉夫及东欧回顾》（*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92年4月，第二期326~327页）上的“对话体 巴赫金和他的世界”（*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一文中。

的，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俄国本土运动，俄国的妇女问题成了测试将西方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全世界妇女的明智性的罗夏测验。^①正如近来一些自我批评的女性主义者所论述的，影响妇女的有关历史和文化差异的知识越多，必然愈加扩大社会性别理论的界限。笔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女性问题具体化的尝试，得力于女性主义理论乐于自我反省的态度，^②以及诸如恩格斯泰因等学者的研究，其研究将妇女的生活与更广泛的文学、现代主义及法律改革史联系了起来。^③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引入到通过刻意重读来强调妇女的“生动的对话表现”，这是证实在一个新的视觉场中双影像区的统一的一个途径。^④双影像区的概念表达了男女之间（如同国家之间、理论之间）看与读的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被人们接受，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 20 世纪 20 年代后的心理分析领域，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法国存在主义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巴赫金新译本的

① 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是瑞士医生罗夏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创立的投射测验。它是以墨迹偶然形成的模样为刺激版图，让被试自由地看并说出所浮想到的东西，即测验要求被测者描述在偶然形成的暧昧的墨迹刺激中“看到了什么”，并说出自己的知觉体验。在进行这样的测验时，被试必须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进行反映。罗夏测验用于测量人的潜质。——译者注

②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描述了一种女性主义符号学，它是“一种开放的研究形式，一种不断的批评。它将矛头转向自己，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参见 L. 鲁迪兹（L. Roudiez）主编的《语言中的欲望》（*Desire in Language*）一书中，克里斯蒂娃所写的导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

③ 有关革命和“新”女性的讨论，参见巴巴拉·恩格尔（Barbara Engel）的文章“女性革命者：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实例”（*Women as Revolutionaries: The Case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文章收集在布里登索尔（Bridensthal）和孔茨（Koonz）主编的《脱颖而出：欧洲历史中的妇女》（*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7）；和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虚无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1991）。

④ 乔斯，《问题和答案》，第 216~217 页。

出版等，双影像区的概念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上述诸方面。巴赫金新译本的出版令一位评论家称赞他为“20 世纪最杰出思想家之一”。他的有关“异议”（heteroglossia）的理论会证实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① 在 90 年代，紧随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巴赫金和共产主义的“解体”之后，对陀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女性”的“后现代主义”解读需要一种混合词汇。本书中关于诸如《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主体性赋性”^② 问题的评论，旨在完善（当不再修正时）传统的忽略性别差异的解读。

对于那种没有把性别问题纳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传统主义的评论家来说，小说似乎表现了一种本质的“人性”。1971 年，理查德·皮斯（Richard Peace）根据作者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以下这段议论，提出“卡拉玛佐夫式”就是小说家心目中的“男人”原型。

（他们）能包容形形色色的矛盾，能在具有一种思想的深度的同时具有与之相矛盾的另一种：我们之上的苍穹深处，最高理想之深处；我们之下的地狱深处，最底层的，充满恶臭的堕落的深渊。（《卡拉玛佐夫兄弟》^③ 第六章第 12 页）

① 参见迈克尔·霍尔奎斯特为《M. M. 巴赫金的对话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by M. M. Bakhtin*）所作的导言，这本书由迈克尔·霍尔奎斯特和卡里尔·爱默生共同翻译（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第 xvi ~ xvii 页。

② 文森特·M. 科拉彼特罗（Vincent M. Colapietro）把这个术语描述成“一个人类有机体在被各种表现体系接纳后，便成为一个主体，一个具有性或社会性别身份的分裂的生物（觉察／未觉察的）。这个表达包括了一个双关语，因为它影响了“赋性”的两方面的含义（赋予生命的过程和获得社会性别的过程）”。参见科拉彼特罗的《符号学语义汇编》（*Glossary of Semiotics*）（纽约：帕拉根书屋，1993），第 98 页。

③ 本书采用理查德·佩韦尔（Richard Pevear）和拉莉莎·沃洛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的英译本（旧金山：北点出版社，1990）。

皮斯把卡捷琳娜和格鲁申卡都描写成“内心包含着善恶两极”。两个女人的美德又是她们自己的邪恶之处。但皮斯又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这样明显的极端化分析起来从不是太简单的事”。皮斯没有使用任何可能标明男女小说人物的反应差异的意义的词语。他迅速地转向了主题，即“德米特里与两女子的关系……用意义深远的象征加入表达——金钱。”^① 在他的解读中，两性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质”来说，在心理和情感上显为一体，但正如皮斯自己所补充的，这种描述本身似乎过于简单化了。

黛安·沃宁·汤普森（Diane Oenning Thompson）于1991年写道，她对《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母性和记忆是怎样联系的问题非常敏感，她还提供了关于阿廖沙的母亲如何打动了他的最强有力的解读。但是，和皮斯一样，汤普森也避免女性主义的方法，甚至在她强调阿廖沙对妇女的认同时也不例外。汤普森写道，“小说沿着一条中轴线被分开。轴的两极是在宗教、哲学上截然对立的立场，它们体现在小说虚构立场的支持者身上，并被引入到针锋相对的激烈的对话关系中。”^② 在笔者看来，像皮斯那样，汤普森把丽莎、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描写成有着同样的心理和对男人的宗教质疑。甚至当她注意到了就笔者看来同样能达到妇女的社会和历史结构差异上的两极化时亦然。

爱德华·沃赛奥莱克（Edward Wasiolek）首次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性格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指出，阿廖沙在对她的理解上存在困难，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困难”。但他通过将其归入纳

① 理查德·皮斯（Richard Peace），《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作品考察》（Dostoevsky : An Examination of His Major Novel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第230~232页

② 黛安·汤普森（Diane Thompson），《〈卡拉玛佐夫兄弟〉和记忆诗学》（“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the Poetics of Mem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55页。